

父子爭狀元

姚 藍 著



目 录

父子爭状元.....	(1)
跃进“式”风箱.....	(9)
树.....	(13)
协作之花.....	(19)
师徒之間.....	(31)
老俩口.....	(43)

父子爭状元

跃进“式”风箱

树

父子爭狀元

你們村也為秋麥開討論會啦，好！就得辯論辯論。保守思想去不掉，生產就鬧不好。

咋說？——你不信每畝地能打三萬斤。老哥，你可別不信，這會兒的年月，摘星星換月亮都行，要什麼，就有什麼。你沒聽說，稻子一畝地有上十二萬斤的啦。

年時種麥，俺吃過保守的虧，那事，俺能記一輩子。老哥，咱倆走着路，全當說話解悶兒，俺把俺去年小麥豐產競賽的故事講給你听听。

俺叫張法，從十五歲就扛鋤下地，到如今整整四十個年頭了。不是俺向老哥夸海口，在莊稼活上，雖說够不上“百事通”，可也能摸個八九不離十。

1956年春天，俺村轉成了高級社。選技術股長時，很多人都說：“那还用選嗎？禿子頭上的虱子，明擺着的，除了老張法，別的還有二家！”參加大會的二百來人，總舉够三百多只拳頭。打那時候起，俺就當了技術股長。在做農活上，不管誰遇到啥難題，都說：“去問問技術股長去。”俺說出來的話，總是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，從來也沒有人打過犢。

可是俺万万沒料想到，在年時秋後種麥子時，有人不光給我打了犢，還竟敢給我競賽比武哩。給我比賽的人，要是田老頭、楊三能，倒也罷了，他們都有真能耐；可你猜一猜，要給我比賽的是誰——是俺的那個還沒跟我學全活的孩娃子。

俺这孩子叫秀山。今年才二十一岁，是前年回社参加生产的初中毕业生，听说在学校里的时候，人家就好学啥子植物学呀、土壤学呀，这几门功课总是考五分。回社后，就和他的毕业同学五成、宝山、秀英几个人，成立了一个米丘林研究小组。因为他是团支书，又好钻研技术，大家就选他当了组长。俺平时给他几个零花钱，他一个子儿也不舍得花。他订了“农业技术”“农村青年”“学科学”“怎样种好高产作物”好几套书。做罢活，就和他的组员到一块看呀、讨论呀、研究呀，硬往里边钻。咱坐根就是个庄稼人，看到孩子喜欢农业技术，心中也怪高兴，也就不断把一些技术活指拨他，他很听话，总要把要紧的节骨眼，记到他的小本上。有一年光景，不管扬场放碾、犁耨耙锄，他都能伸上手干了。和咱不一样的是，人家还能讲一套啥子氮、磷、钾呀，啥子团粒呀的新道理。

年时秋后大跃进时，社里要成立青年丰产队。一伙年青人，又选秀山当了青年丰产队长。村中一些人说：“秀山有文化，懂技术，又有钻研劲，除了叫他当头头，别的小伙子有谁能使得开呢？”也有人说：“龙生龙，凤生凤，强将手下无弱兵。老子是技术股长儿子还能瓢了！”这话咱当大人的听到耳朵眼里，嘴中虽不能说啥，老实说，心中实在比喝两碗蜜糖水还凉甜哩。社支书张斌同志，为的培养他们，还把以前我搞丰产的四亩老园子地，拨给他们当试验田。又指明叫我这个技术股长，当他们青年丰产队的技术员。咱也爱好这一门，就满口答应下来了。

年时秋罢种麦子时，社里召开管理委员会和技术委员会，订1958年小麦丰产计划。那时，农业大跃进已在俺社山摇地动的干起来。张支书在会上说：“1956年咱社大搞了一年水利，大

部分地已經变成水地，1957年小麦每亩已收到200斤。1958年要大跃进哩，我看咱叫他产量翻一番，每亩收它400斤，把农业发展纲要的10年产量规划，咱給它一季实现吧！”“好！”他的话絕大多数人都贊成了。他又回头問我：“技术股长，你的意見呢？”按老实說，我覺得一亩地收400斤怪不少，可咱是技术股长，在跃进中能泄大家的勁嗎？我低头揣摸了一会，回答說：

“支书，年时我搞的丰产麦，每亩都收到600多斤，今年咱的水地和肥料都多啦，加加勁，我看能收到400斤。”大家知道俺在农活上掌的舵总是四平八穩，我一說中，就跑不了多大板眼。这一来，大伙的信心更高了，都說：“技术股长說的对。”誰知俺秀山却站起来說：“人家外社有过长江的哩，有小麦千斤社哩，咱們訂400斤連黄河也沒过去，我看指标就訂的低。”張支书考虑了一下說：“那这好啦，咱每亩訂成450斤，爭取550斤吧？”大家都通过了这个決議。我心想：550斤是个爭取数，收不到也就算啦，总不能因为这就撤了我技术股长的职，也就沒再說什么。

“你今年的丰产麦計劃 搞多少斤呢？”支书問我。我心想：大跃进的嗎，我把丰产麦翻一番。我心想：这一下子过了长江，又过了千斤大关，說出来一定会吓人一跳，我大声說：“我的丰产地产量也要翻一番，每亩收1,200斤！”

“1200斤太低，太低，”俺秀山站起来反对我了：“俺們青年在县里开展了‘三双’竞赛，我和团支部研究了一下，决定要搞‘双千斤’丰产麦哩……”

一听这话，有人伸出舌头半天縮不进去。我心中說：老天爷呀！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，一亩地收二千斤，开天辟地也沒有听到过呀。我便制止他說：

“秀山！你瘋了吧，這可是管委會上訂計劃的呀。”

“爹，”俺秀山象受了滿肚子委屈：“我說的全是正話，難道你以為我在這裡吹大氣開玩笑嗎？”

我冷笑了一聲說：“好，那你就擺擺你們憑啥一畝地要收二千斤麥子吧？”

俺秀山給我搬着指頭算起來：“爹！你听听：第一，咱們那四畝老水地，已套犁了二尺半深；第二，每畝已施底肥5萬斤；第三，今後要實行五肥六水，鋤草滅蟲；第四，要改種碧蚂4號良種，每畝地由以前的十五斤增加到三十斤種子……”

“胡鬧！胡鬧！”前邊幾條我都相信，一聽說一畝地要種三十斤麥種，我實在聽不下去了：“這是種麥子，可不是長豆芽！”

旁邊有些人也吵着說三十斤太多，有些人說中。支書張斌說：“還讓秀山說下去。”

俺秀山便向我解釋起來：“增加播種量，實行窄壟勻播密植，這是外地一條重要的豐產經驗，在縣開會時，小麥土專家齊同志，給俺們講的可清啦……”

“我不管他齊專家、尖專家，”我不想聽秀山的話了：“我種過四十年地，啥活咋做還不知道，糞大水勤不用問人，想多打糧食嗎，別無二法。”

“爹，”秀山仍然慢慢向我解釋：“密植經驗，外地已經試驗成功了，你還不相信。光按老辦法辦事，就是保守。”

“胡說！”我一听真惱火了，心想：你個毛孩子家，吃的糧食沒有我吃的鹽多，走的路沒有我過的橋多，你竟敢當着眾人面，教訓我，這還了得？！便怒沖沖的對秀山說：“你們青年人都是屬猴的，見別人弄啥，你們弄啥，打不上糧食來你能負

起这个責任嗎？这么大的一个社，我决不允許你胡鬧。”保管員田老头和生产队长楊三能，也在一旁替我帮腔：“秀山，以前咱一亩地只种五、六斤麦种，而今变了水地，种十五斤就足了，再多就长不起来啦。”秀山还想說什么，沒等他开口，我站起来說：“誰的办法好，叫他走他的阳关道，我偏要走我的独木桥。我是社里的技术股长，一亩地只能种十四、五斤。”

支书說：“張法，你这就不对了，现在是开管理委员会嘛！大家都是平等的，你不能用老子訓儿子的口气訓人。”接着又說：“我同意秀山的意見，密植是別处的先进經驗，我們應該学习人家。”

會議一直开到雞叫两遍，也沒有把我給說服。不少人都說：“密植也得有个限制，太密了，也不行。一亩地十五斤麦种，已經是老輩子沒有过的了，哪能用三十斤种！”

誰也說不服誰，末了这样做了决定：把社里的四亩老水地种丰产麦，二亩归我管，二亩归秀山他們那伙年青人管。

秋分前，俺們把一块四亩丰产地匀分成两块，一齐种上了丰产小麦。我地头上插的牌子写的是：“丰产麦地二亩，深犁2尺半，亩施底肥5万斤，要再追粗肥3万斤，細肥100斤，实行五肥六水，每亩下种15斤，要求亩产1200斤，爭取1300斤，負責人張法。”我走到东边地头一看，牌子上写的是：“丰产麦二亩，深翻2尺半，亩施底肥5万斤，要再追粗肥3万斤，細肥100斤，实行五肥六水，每亩下种30斤，要求亩产2000斤，爭取2500斤，負責人張秀山……”我看了，鼻子里冷笑了一声：“哼！真有种往上写呀！”

种完种子的那天傍晚，弯弯的月亮，象镰刀似的挂在天空，照得地上亮堂堂的。



我吃了飯，往茅房去。路过秀山的窗下时，听见秀山和媳妇兰花在屋里说话。本来，咱当大人的，是怎么也不该听孩子们的私房话的。可我一听说种麦长、种麦短，不由的就轻轻止住脚步，站下听起来。

“秀山，咱爹一亩地倒底种了多少斤麦种？”

“十五斤呗。”

“你没把他说服？”

“哼，他没有见过的新东西，他就不相信，你把嘴唇磨薄，他还是他的老主意。我为这事去找过社支书，社支书说：‘你

爹对密植鬧不通，这是几千年遺留下来的老思想，我們跟他的斗争，是生产上先进思想和保守思想两条路綫的斗争，决不是三言两語能解决問題的。現在一亩地种三十斤麦种，大多数社員都不通，咱不能强在全社推广，如果强要推广，就会脱离羣众。毛主席教导我們要普遍推广試驗田。你們可在試驗田中种密植麦子，种好了，用事实教育大家。’

我一肚子气走开了，心中說：“好，毛孩子家吹的口气真不小，地里活还没跟我学全，倒敢跟老子拉开战場比本領分高低了。好，好，好！我大江大海过了千千万，难道在你这条小小沟中还能翻了船！咱們騎驢看唱本——走着瞧！”

打那天起，每逢俺爷俩在丰产地中干活，劲头就鼓足了。秀山总是想：咱是提倡技术革新的，总得努把力，把密植小麦种好，叫你們看看。我总是想：我种了一輩子地，誰不服我老張法的本領，你个毛孩子家，竟敢給我比本領分高低，非得在校場中給你点顏色看看不行；要不，你也不知道你自己有多粗多大了。再說，胜了他們，也好叫社里人都說：“幸亏沒有听那般人的胡来，要不是技术股长把的稳，全社还不知要少收多少麦子哩。”

俺爷儿俩竞赛的事，成了村中人談話的材料。人們說：“秀山那伙人身强力壯，懂得新技术，老張法是个庄稼精，滾地龙。真是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，这一場厮杀，还不知道誰胜誰敗呢？”

轉眼，麦子已經吐齐了穗。

常言說得好：“功沒白使，勁沒白用。”我种的那二亩丰产麦，长的有齐肩深，穗子又长又粗。象这样的麦子，連我也是头一回看見。可是比一比，秀山他們种的麦子，并不比我的

甌，四沟麦壠，却比我的多一沟还多，麦壠也比我的厚。我开始感到有点不妙了。

有一天，我正在地头看麦子，从西边过来两个老头。走在前边的那人，一看见我种的丰产麦，吃惊地说：“看！这块麦子长的多排场，根根都象小竹竿，一亩地收它一千五六百斤，在手心握着的。”我听了觉得怪得意。那人走到东边看了秀山他們的丰产麦，竟大声喊起来：“啊呀！誰知天外还有天哩！”我听了心想：这回算是輸定了。

小滿过后，滿地变成一片金黄色。

麦子傍熟的时候，社支书領着县委薛書記、齐专家，还有全体社員，到地里評比小麦。走到地头时，社支书把两块丰产麦的管理情况从根到梢說了一遍。薛書記向大家說：“这两块丰产地，是一样的地板，一样上肥澆水，你們瞧，稀植小麦比密植小麦差多少呀，你們不相信密植新技术，看吃多大的亏！”我的心，簡直比針刺的还疼。

麦收时，这两块地进行了单收单打。打場那天，来場看过秤的人真多，跟秀山一块种丰产地的五成，压根就沒离开場。打完場，一过秤，我种的丰产麦子，每亩收了一千八百斤，比年时的丰产麦产量高了两倍，比社里今年的普通小麦高一千斤还多。可秀山他們的丰产麦每亩收了三千零二十斤。老天爷呀，他們又比我的多了一千一百七十斤。

那伙年青小伙子，霎时都象瘋了一样，一跳三尺高，高喊：“毛主席万岁！”“庆祝小麦大丰收！”有的高兴的流了眼淚。秀山被那些年青小伙子，举到半空中，一抛老高。

我呆痴痴的，心中又高兴，又有些不自在。我問自己：你是怎么回事呀？我反复想了半天，才真正明白过来：就因为

咱这保守脑瓜装不进新技术呀！

我想到：自己丢脸是小事，顶多叫人说我老张法竞赛输给儿子了。可社里没有密植了，要少收多少小麦呀？我狠劲捶了自己脑袋几下子，猛地站起来往村中走去。

才走到村边，一伙年青小伙子向我跑来。五成在前头边跑边喊：“这是向毛主席写的丰产喜报，上边有你的名哩，快盖个手章！”我这个50多岁的老头子，一下子好象变成个新媳妇了，觉得脸上热呼呼的。羞答答的说：“你大叔不信政府的话，太对不住毛主席啦，孩子，快把我的名子勾了。我正要找党支书检讨哩。”我难过的眼里湿乎乎的。五成鼓励我说：“大叔，别难过，咱们给他以后瞧！”秀山也说：“爹！经一经，精一精，今年有了教训，爹的思想解放了，下年订的指标再高点也能收到。”我的劲头忽的一下子来了，我说：“你们说的对，只要敢想就能办到。今年秋季我要搞一千斤皮棉丰产亩，一万斤玉菱丰产亩。十万斤红薯丰产亩。明年小麦要叫它一亩地收一万斤。”大家哈哈大笑地说：“一定能收到！”

一羣年青人，好象一个有力的大旋风一样，前后簇拥着我这个老头子，顺着光明大道，大步如飞的朝党支书那边走去。

1958年8月

“跃进式”风箱

所有到过湯阴钢铁工地的人，一眼就会看到，有很多高炉在用“跃进式”大风箱炼铁。说起造这种风箱来，中间还有一段故事哩。

1958年10月里的一天，城关营造厂的木工老师傅張忠，正在車間干活。这时，厂党委張書記，領着一个衣着很朴素的人走进来，向他介紹說：“这就是咱县县委会徐部长。”

徐部长滿面笑容地握着張忠的手說：“張师傅，有一件事要請你帮忙。县委为了提高鉄的质量，打算普遍推广高炉炼鉄，想請你造一种炼鉄用的大风箱。”

在大办鋼鉄开始时，張师傅就爭着报名上山。因为他已是五十二岁的人啦，领导沒批准，他心中别扭了好几天。听了徐部长这話，他高兴得滿臉皺紋都舒展了。心里想：“沒想到咱还能給鋼鉄元帅出把力哩！”他一拍胸脯滿有把握地說：“徐部长，别的活咱不敢說，要說造风箱这活嘛，你交給我張忠就甭管啦。”

造风箱——这是張家祖傳的絕艺。張忠的爷爷張錫朋，还是在二十岁的时候，听說天下的风箱数洛阳魏家的好。便千方百计地千里拜师学了艺，回来就开了“同盛号”风箱鋪。張忠的父亲，又进一步把合风箱用的直木樨，改成外大里小的狗牙樨，使风箱結实得象鉄鑄的一样。張忠从十四岁学艺，玩风箱也近四十年了。祖孙三代卖风箱百十年，“同盛号”成了远近皆知的金字招牌。張师傅觉得，这一下子英雄有用武之地了，他把生平造风箱所有的經驗都施展出来，精心的画出了規格草图。当天，就率領着木工干起来了。沒过几天，全厂就造了二十来个大风箱。这种风箱长四尺五、高三尺，一試风，能在风口三尺处，三下子就把磚头打倒。

这批大风箱送到鋼鉄工地后，在高炉上一試驗，还是因为风小沒炼出鉄水来。但是，用在炼鋼的平炉上，却很解决问题。張师傅想：高炉炼鉄本来就是用机器鼓风的嘛，大风箱能

煉出鋼來也不賴，我老汉总算沒有白掬了這分力！

半月后的一天上午，張師傅正在領着大伙做風箱，張書記、徐部長領着兩名木匠模樣的人，又來到了車間。一回生，兩回熟，徐部長象對老朋友似的說：“張師傅，我剛和工地這兩位木工師傅去河北曲周參觀回來。嘿！人家曲周式風箱可在高爐上煉鐵成功了。縣委準備大量仿造。你是行家，這任務還是交給你吧！”

張師傅心里有些不痛快，他想：“天下風箱數洛陽，洛陽風箱沒我張家的好。你既然知道俺是做風箱的行手，還叫我學啥曲周式呀！”他想了一會，才慢騰騰地說：“咱這笨手笨腳的，恐怕仿造不好吧！”

徐部長一邊翻筆記本，一邊急忙說：“這是曲周式風箱的尺碼規格，你比着做就是了。張師傅，你要仿不好，還有誰能行呢？”

張師傅覺得：自己要是一口咬定不做，也真說不出口。做吧，又覺得“同盛號”的風箱還煉不出鐵，學別處的風箱也是白搭。不過，他到底找出了個兩全的辦法，便說：“要叫咱比葫蘆畫瓢做，倒也能做。做出來風不大，可不能怨我！”

“不怨你！大胆做吧。”徐部長和張師傅說好后，還叫一塊去參觀過的木工老李、老田，留下來幫他搞。

張師傅有些不大服氣：“咱老張忠玩了一輩子風箱，沒想到臨老又二次拜師傅！”但回頭一想：“沒關係，不怕不識貨，就怕貨比貨。等做出來一比較，誰好誰歹，便知分曉。”想到這里，他又快活起來。

一架曲周式風箱，很快就仿造成功了。這風箱長五尺七寸，高一尺六寸，寬一尺二寸三。老李說：“張師傅，你先來試試

风！”張忠一看那风箱身長肚小，就有点沒好气地說：“要試咱到院里和咱的大风箱比着試吧。要是他的风大了，俺的招牌情愿砍掉。

风箱比賽开始了，周圍站了一圈人。徐部长也来了。

張师傅把自造的“同盛号”大风箱搬到中間，在风口支好磚，他来回拉风把。这个风箱是他專門精选了好鸡毛造出的。在三尺处一下就把磚打倒了，接着，在三下中，三尺二、三尺四，最远打到了三尺六。人們欢喜地喊起来了。張师傅也有点洋洋自得。

徐部长和老李把那个曲周式风箱抬到中間。他压着风箱，老李拉着风箱把，張师傅把磚支在离风口二尺半远的地方。徐部长一看，說：“再支远一点！”張师傅想：“嘿，就这么远能吹倒就不賴了。”在徐部长的一再催促下，他賭气地一下子把磚支在三尺六寸处，說了声：“打吧！”老李猛勁一拉箱杆，看时，那磚头象树叶一样，被吹倒了。

“好！”人們欢呼起来。張师傅“哎！”了一声，惊異的半天合不住嘴。

接着，四尺五、四尺八，最远到五尺一。曲周式风箱胜利了！

徐部长过来，拍着張忠的肩头，笑着問：“怎么样？”張忠的臉刷的一下子紅了。他搖着头，結巴地說：“真——真沒想到天外还有天哩！”

徐部长又象解釋又象安慰地說：“你們張家做风箱的名声，以前我也听到过，这决不能怨你們‘同盛号’出的貨孌。只因为現在大家都在大跃进，人家跃进的更快！”

夜間，張师傅睡在床上，象身下鋪着蒺藜似的，翻来复去

睡不着。他心想：同样都是毛主席领导的天下，人家能大跃进，我就不能大跃进；他马上下了床，悄悄地往車間走去。

灯光下，張师傅仔細端詳着那架曲周式风箱。到底行家眼尖，他一会就看出曲周式风箱美中不足的地方来，就自言自語地說：“只是这风嘴有些过粗过短。”他連夜忙起来，把风嘴改小了七分五，加长了一寸，进风門也加寬了六分。这回，他独自一試驗，最远能在六尺六寸远的地方，三下把磚吹倒。

营造厂抬着新改进了的曲周式风箱，向县委报了喜。鋼鉄工地的高炉很快就用上这改造过的大风箱，炼出了大堆大堆的灰生鉄。徐部长为这事来找張师傅，他正在兴致勃勃地赶做新式风箱。徐部长指着那个改进了的曲周式风箱說：“張师傅思想解放了，做的风箱也跃进了。就叫它为‘跃进式’风箱吧！”

張师傅喜得笑起来，說：“这个名字好！这个名字好！”

树

我在漳河指揮部做各料工作。領導上要求在七月二十号大汛未到之前，要把各农业社負責筹备的二百余根电綫杆子收齐，月底必須把通往县防汛指揮部的电綫架通。可是到了七月十九日这天，別的社都已把电綫杆子送齐了，唯独王庄社的五根电綫杆子还迟迟沒有送到。眼看就剩下一天時間，我們再也不能等下去了，領導上便决定让我亲自去王庄社看一下。

吃过早飯后，我騎上指揮部那輛嶄新的飛鴿牌自行車，就風馳電掣般地向王庄奔去。當時，正值初秋時候，路兩旁是一眼看不到邊的大平原，整個廣闊的田間，好象鋪着仙女織的一面巧奪天工的綠色絨氈似的。那些盛旺的棉苗棵上，開出了滿枝紅的、白的、紫的各色花朵，低頭含羞的谷穗，也在迎風飄舞，到處呈現出一片喜人的丰收景象。但是，這些誘人的美景，我却無暇欣賞。

有吃一頓飯的功夫，我已來到王庄。在村東頭的路旁，並排長着五棵筆直秀麗的白楊樹，它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我的心。

我下了車子，仔細地把樹端詳了一下，又用手量了一下樹圍，那些樹都有三丈來高，三把多粗。呀，不粗不細的正好够作電綫杆的材料，我心中不禁有些高興起來。進村一打听，是本村王明老漢的樹。

我到村子里找到社長王華。因為和他在區上就認識，便直接了當地問他：“老王：區上分配給你們社的五根電綫杆子任務，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送去呢？”

“老姚，”他苦笑了一下說：“全村的樹，解放前都叫匪軍給鋸光了，剩下的一些老樹，都七弓八彎的象犁杖，小樹又還沒有長成，你瞅瞅村上那有一根合格的呀？”

“你撒謊！”我听了他的話后，便胸有成竹地兩眼盯着他的臉：“村東頭路邊那一排五棵白楊樹，不是你們社的嗎？你說。”

“不錯，”王華嘆了一口氣說：“那是俺村王明老漢的樹，不过他一定不肯賣。”

“為什麼？”我不禁好奇地問。

“說起來話長。”接着王華便把關於那些樹的來歷告訴了

我：

“現在那長樹的地方，從前原有五棵合抱不住的大楊樹。民國二十六年秋天，漳河漲了大水，淹的莊稼一苗未留。全村的窮人大都被餓得走山西下河南逃荒要飯去了，唯獨俺王明叔賣了那五棵大楊樹，換回來三石多大米，全家平安地渡過了荒年。打那以後，他家的人都稱那些楊樹是‘救命樹’。後來，到1947年，那五棵老樹的根上，又長成了五棵矗直的大楊樹，他全家都愛護極了。誰知在那兵荒馬亂的年月里，崔家橋集上住的匪軍要修砲樓呢，便蠻不講理地硬給它鋸走了。俺王明叔氣不過，當時上前爭辯了兩句，那個偽排長便惱火了。他瞪起那雙惡狠狠的三角眼，一脚把俺王明叔踢倒地上，口中還罵道：

“他媽的！老子鋸你幾棵樹，你還不樂意，沒有把你的房子拆了還不夠抬舉你，真不識好歹……”氣的俺老明叔一下病了一月多。如今這樹是第三次從老樹根上長起來的，是多麼不容易呀！俺老明叔對這些樹比待兒子還親，還愛護。今春西頭張全家要蓋房子用梁，托人來說情願一棵樹給他十五元，俺老明叔听了直搖頭，說：‘這樹我貴賤不賣。’咱區上通知說，每根杆子定價十二元，你想俺老明叔會賣嗎？”

我听了王華的話後，覺得想買下這些樹恐怕也真有點不容易。不過完不成任務，我總是不甘心的，便問王華：“你和王明老漢談過這事沒有？”

“——沒有。”王華臉一紅，有點口吃地說。

“你沒有和人家談過，怎能斷定人家一定不肯賣呢？”我拉住王華的手說：“走！咱們一塊去和王明老漢談談，試試看。”王華不服氣地向我打賭說：“甭去試了，如果你能買下俺老明叔的那五棵樹，我情願讓你割下我的頭當籃球打（他知